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臺灣在歷史上的定位，最獨特且最複雜的特徵之一，便是它的政治歷史。自 1624 年至 1945 年的三百多餘年間，臺灣經歷了荷蘭（期間西班牙曾據有臺灣北部地區，但僅有 16 年）、鄭氏政權、清廷以及日本的統治，在這樣特殊的政治經驗衝擊之下，臺灣社會在文化及心理的層面上都經歷了複雜且微妙的演變，而臺灣的歷史發展在社會及經濟上的建設也一直是現代化的先驅。（張世賢等，1980：231-238）。

一、研究動機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廷在翌年簽訂的和約中，將戰爭期間「其（日本）兵力所不及」的臺灣¹，「永遠讓與」日本。合約締結之後，臺灣紳民在倉卒之間起而組織「臺灣民主國」²，作為反日主體和日軍作浴血抵抗，但不久即告事敗。日本在實施殖民統治的過程中，遭逢了各種方式的抵抗，抵抗的形式最初以武力抗爭為主，武力反日運動平靖之後，非武裝的抗爭又繼之而起，而這樣的抗爭運動幾乎是和日本的統治時期相始終的。而日治時代臺灣的民族運動的性質分野，一般是以 1915 年的西來庵武裝反日事件為分水嶺，前期是武力反反日本統治的時期，後期則是進入非武裝的政治運動階段，而非武裝的政治運動更是合乎近代民族運動的定義，它是以啟蒙思想及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來爭取政治權力為重心的政治運動。而當時新興的社會主義思想更是受到當時臺灣許多知識份子的重視，皆因當時臺灣在經濟上淪為日本財閥獨佔資本主義下榨取、掠奪的對象（郭嘉雄，1974：48-57；黃靜嘉，1960：36-38），臺灣人民的權利和利益根本無法獲得基本的保障；以及社會主義及其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亞

¹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選輯（台北：台灣銀行，1964 年），頁 223。

² 光緒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五月二十五日組成反日政府，由唐景崧的幕僚建議命名為「台灣民主國」，改年號為「永清」，制定藍地黃虎國旗，公推唐景崧為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丘逢甲為義勇統領（一說為副總統）。同時發布〈告全台書〉，照會各國領事。六月三日日軍攻陷基隆，唐景崧乘船逃往廈門，丘逢甲等也相繼返回大陸，成立只有十二天的「台灣民主國」宣告結束。

洲地區又幾乎是蓬勃發展起來。

而在這樣以思想為主導的抗爭運動中，臺灣島內的知識份子始終扮演著具有關鍵性的領導角色，在政治運動上，他們將社會主義的觀念帶入農、工團體之中，以期促成臺灣能夠脫離日本而獨立，影響所及於 1928 年更是有日本共產黨臺灣支部的成立；在文學運動上他們抨擊舊文學、皇民文學，走出屬於左翼文學的路來，甚而帶動了當時臺灣新劇運動的風潮。但左翼思想在當時的日本政府卻一再的遭到打壓，到了戒嚴時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體制，也大規模的逮捕有關的左翼運動者，在實質的政治意義上，正好代表著殖民統治者在面對殖民地知識份子抵抗時所會做出的相同反應，這便說明了左翼運動及其代表的思想在臺灣殖民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陳芳明，1996：453）

二、研究問題

研究本論文的主要動機，觀察臺灣有關左翼思想的歷史紀錄，至 1987 年戒嚴之後，才有逐漸開放的紀錄，而當時參與這些政治抗爭運動的臺灣知識份子，在戰後面對龐雜的、分歧的殖民地歷史解釋時，卻獨缺左翼人士的發言；邇來，學術界陸續發表了許多日治時期左翼人士的回憶錄，對於想研究此段歷史的我不會有資料缺乏之感，而關於我的研究問題，主要是以下幾點：

1. 想藉此了解左翼思想為何會導致反日團體的質變與分裂？
2. 除了重構左翼歷史的史實外，也試著分析大陸對「台獨」立場的轉變？
3. 回歸歷史本質，找尋台共成員提倡「台灣獨立」的真正意義究竟為何？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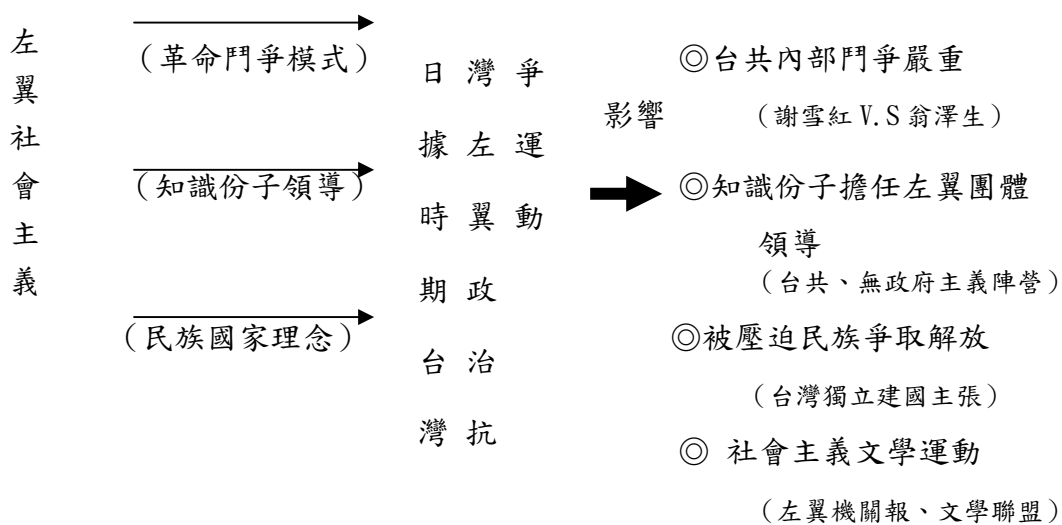
由於論文的研究主題是在探究社會主義（及其後更左傾發展的共產主義）帶給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團體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左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革命的原則，在中共和台共的內部領導之下，又出現了哪些變異的結果？

自第三國際建立以來，被共產國家奉為主臬的左翼社會主義指導原則，便被視為共產革命運動及共黨組織的最高指導標準，在那時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確

實受到了許多知識份子及深受資本主義剝削之苦的人民信賴，而分析左翼社會主義迥異於當時其他的政治思想，也確實有其特出的政治意涵及領導策略，由於筆者主要探討的是當時的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對日治台灣時期的政治動究竟有怎樣的影響，而其影響的因素和關鍵，是否又是決定著當時反抗運動成敗的主因，此項問題的探討便成為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架構。

茲將本論文主要的研究架構呈現如下：

社會主義對台灣左翼政治運動的影響分析：



二、研究方法

(一) 歷史研究法

就整體史學而言，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在於經由史料收集，邏輯推理和科學方法，探討事件的起源以發現真正的「史實」。但也有論者認為「史料」本身並不具有意義，其意義存在於「歷史的建構」，也就是說歷史事實的產生有賴於研究者的「想像建構」。歷史知識，對研究者而言，是有意義的往事「重整」。其次，就歷史的敘述活動而言，任何言詞的敘述皆無法避免價值的判斷。因此，對任何社會歷史的敘述，都必須抱持中立性批判的態度來對待，否則容易為論者的事事情節所引導。

歷史研究途徑的功能，在於描述歷史事實，並以此特定的環境時空中，歸納出事件的因果關聯，並據此因果關聯來「重建過去」(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透過這樣的研究途徑，不但可以透析制度的本質，也有助於了解歷史制度形成的特定方式。（Robert A. Dah, 1992: 34）由於研究客體為臺灣在日治時期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及非武力抗爭，在研究方法上採歷史研究法。歷史研究法，透過歷史事件之資料蒐集與分析，就此時發生的社會運動及團體的抗爭中，分析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在團體中所發生的轉變，分析時間是以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為止，根據一些相關的歷史資料加以分析。

本論文採用歷史研究法以時間縱貫的方式，蒐集日治時期以來左翼思想的資料（例如政治團體、文學作品等等），加以分析、評鑑台灣共產黨 1928 年綱領的成立之因，並對 1920 年後的左翼思潮提出詳盡的描述與解釋，期望能對台灣共產黨的「台獨黨綱」作一完整性的分析論述。

而要了解台灣共產黨之所以產生，就必須了解日治時期台灣的歷史經驗，包括社會主義及共產思想傳入台灣當時在社會經濟上的特殊影響，而台灣日治時期的特殊性有以下幾點：

1. 日治時期台灣政治、經濟環境的特殊性
2. 日治時期知識份子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3. 日治時期政治團體左、右翼流派的分別
4. 台灣共產黨左傾政策—台獨黨綱立論起源

本文試圖以歷史經驗的分析，來解釋台灣共產黨的「台獨綱領」產生的歷史脈絡為何，而此綱領又為何會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論點，「台獨」的意義究竟是就台共成員說的屬於中國領土「自治」（蘇新，1993: 83）；又或者如史明、陳芳明等學者堅持台共成員的「自治」，其實是「高度自治」的意義，只因為台共成員自 228 事件後流落北京，因政治氣氛的高壓致使他們無法表他們的主張，如謝雪紅的「自治」主張，被中共在 1968 年的整肅中批鬥，並被冠上「資產階級右派」及「出賣同志」的罪名，在 1970 年時更被「鞭撻而死」（陳芳明，1991: 42）。由此可知，不同的歷史經驗，使得「台獨綱領」的論述呈現不同的解釋，使得政治學界的「統派」與「獨派」就此段歷史的真相辯論不休，筆者試以台共成員的專書論著再配合上中共歷史對於此段時期台共歷史的論述，找出「台獨」綱領的政治主張究竟為何？在去研究中共立場是否發生轉變。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希望透過資料的蒐集與運用來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本研究希望透過學者相關的文獻資料，試著用各種的觀點與角度，分析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有關資料、調查數據以及文獻報導等等，並以當時的社會發展及政治事件為背景，輔以相關理論作分析，並以蒐集的書籍、報章、期刊以及學者所發表的專文等等，作為本論文的實證性分析。

由於本論文研究的是日治時期的左翼政黨活動，在國民黨時代所出版研究日治時期的專書多以右翼政黨活動研究為主，如蔡培火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林獻堂所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但研究時間範圍多講述第一次分裂前的文協—即又一人是主導的文協活動為主）和蔣渭水（也多是講述右翼活動時期的角色）。這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共產主義的敵視及恐懼，再加以左翼份子由於左傾緣故，遭到誣控、監禁甚至槍決，凡涉及左翼思想的文字書籍，都受到查禁，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社會主義在島上可以說被清除的無跡可循，幾乎很少人有機會去接觸左翼思想。而在戒嚴開放後，關於台灣左翼政黨的研究也慢慢豐富起來，開研究之先學者即為史明，後期學者關於台灣左翼政黨的論述如：台灣無產青年會、台灣共產黨多是援引他的著作而來；在 1988 年時連溫卿手稿的出土，更是研究左翼政黨的珍貴史料。

近十幾年來，左翼政黨的人物歷史更是掀起研究的熱潮，如陳芳明在 1991 年所出版的〈謝雪紅評傳〉，便是對左翼政黨—台灣共產黨作出一個全盤並具系統性的介紹；而台共綱領中引人注意的「台獨黨綱」更是讓長期以來主張台獨論者的支持者找到歷史的根據，但由於其「台獨」訴求的爭議性及各派不同的詮釋，遂使「台獨」綱領的產生頗令人玩味之處。

（三）比較研究法

台灣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所遭受到的政治壓迫及經濟壓迫是對台灣人民而言是十分深刻而痛苦的，也是因為在這樣的政治壓迫之下，台灣共產黨才會成立。台灣共產黨成立的宗旨：要扶助弱小民族、訴求政治上的獨立。而其在 1928 年及 1933 年黨綱中的「台灣獨立」論述，更是其創黨的宗旨表現。

比較研究法是針對兩個論述不同的對象，透過比較的方式來凸顯差異性、相關性與特質。本研究希望從日本歷史及研究學者的角度、中國共黨歷史及研究

學者的角度以及台灣日治歷史及研究學者的角度，來觀察「台灣獨立」論述的政治意義為何，並讓歷史的爭議回歸歷史。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由於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是闡述社會主義思想對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研究時間是以 1920 年至 1937 年為止。因臺灣發起對日武裝抗爭運動，在經過 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之後已漸告平息。1920 年，一次大戰方歇，全球近代政治覺醒的殖民地民族自決運動抬頭，加上朝鮮人民向日本當局要求獨立的「萬歲事件」爆發，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改變統治臺灣的策略。首先，便是改變過去武官總督任命慣例，在當年十月改派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來臺；其次，隨即由田健治郎宣布解除武力鎮壓政策，倡導「內地延長主義」的同化政策，強調「臺灣乃是帝國領土之一部分，當然屬於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因此，統治方針……要使本島民眾成為純粹的帝國臣民，必須加以善化教導，以培養對國家的義務觀念」（田健治郎，1937：384）。

而日本統治方針的改變，促使臺灣島內的民族團體紛紛成立，當時在中國及日本的留學生正憧憬著社會主義的美好遠景，於是便將社會主義的思想帶入國內的民族團體中，社會主義思想的傳入便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而臺灣知識份子，由於對不同階級的認同，往往會採取不同的政治路線，意識形態的歧異終究會導致爭論，造成了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的分裂，那也是殖民陰影下臺灣社會矛盾衝突的一個反映。（陳芳明，1992：9）以 1927 年的文化協會分裂為界，自此，左、右翼知識份子各為抗爭路線，或合法、或非法，但團體中所產生的階級鬥爭卻一再內耗革命組織，1937 年中日第二次戰爭爆發，日本加速對臺灣的經濟掠奪，並大舉搜捕左翼運動份子，臺灣共產黨此時也被迫解散，臺灣的民族運動遭受嚴重的打擊，再無繼起之力了。研究範圍從日治時期的臺灣知識份子階層以及當時的社會發展、政治運動、文化運動進而擴展到殖民主義歷史反思，作為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1. 本論文研究年份為 1920 至 1937 年，嚴謹而言，應是從 1920 年至 1937 年底的這一段時期。但凡一種思想的傳播，尤其是社會主義，早在 1917 年蘇聯十月革命時，其屬的馬列主義學說已逐漸影響到學生、知識份子及工人，並紛起結社以研究左翼思想。所以在介紹到社會主義的傳入時，會提及早先的社會背景及國際情勢。
2.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抗爭運動中，學者便依據訴求的途徑及合法性等因素，將此期的運動分為（右翼－民族運動）及（左翼－非法抗爭運動）。由於本論文主要探求社會主義對日治時期各種運動的影響，而社會主義及其屬馬克斯主義、無政府主義是歸類左翼運動的派別，所以本論文只專論左翼運動而已，對於右翼的民族運動會略加提及，但不另作專文闡述。
3. 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為達到合理化其正當性的目的，不能不對具備較強烈反抗性格的知識份子進行徹底的消音行動。這樣的行為，不但扼殺了這些左翼運動者的發言權，也模糊了歷史的解釋權。而其後國民黨政府由於「仇共」的心態，自然也對社會主義思想大加禁止及擯伐，不但模糊了歷史也污名化這些參與抗爭的前輩，以往參與抗爭的左翼革命份子，日後雖有出版回憶錄及專書³，但由於政治環境的拘囿，使他們不能做徹底的解釋。解嚴之後，學者也紛紛研究並依照當時的歷史儘量作一客觀性的分析，在寫作本論文時，筆者將選擇客觀性的資料參考，以求不背離真正的歷史事實呈現。
4. 筆者透過臺灣殖民時期的歷史事實，配合事件背景加以分析。由於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難免受到主、客觀條件及外在環境影響因素而有所變化，筆者雖自許達到學術嚴謹之要求，但難免仍會有疏漏之事宜，此部分筆者將力求排除。

第四節 理論探討與名詞釋義

³ 1946 年，台共工人運動領導者蕭來福，以「蕭友三」的筆名撰寫《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另台共領導人之一的蘇新，在 1947 年逃亡至香港後，也完成了一部《憤怒的台灣》。其他如連溫卿及當時的無政府主義代表者王詩琅都有專書談及此段歷史。

理論探討

在研究台灣的左翼運動論述時，我便自然的聯想到政治學中的〈社會革命〉理論。社會革命不僅具有政治意義，在某些情況下，社會革命還具有催生了具有巨大國際影響和號召力的模式與影響，社會革命不但促成了第三國際的建立，使得社會主義思潮在當時蔚然成風，這股思潮下更激勵了當時深受資本主義之苦的殖民地群眾，以社會主義思潮為其理想，建立革命團體以圖推翻專制帝國。

社會革命也對一個社會的國家和階級結構迅速而根本的作出改造，他們也都伴有或在一定程度上經由自下而上的階級暴動。社會主義革命不同於其他類型的衝突和轉變過程，首先在於它是由兩種重合所組成的：是社會結構變化與階級變動的重合、及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的重合。而社會革命的獨特之處更在於，社會結構變革和政治結構辨格式相輔相成、同時發生的，而且這些變革是透過激烈的社會政治衝突產生的，其中階級鬥爭更發生一種關鍵性的作用。並且以本論文主義的中心思想—馬克思，他更提出在社會中革命矛盾的基本根源，是生產方式中社會力量與社會生產關係發生脫節，而這個脫節就表現為激烈的階級衝突。馬克思的此種論述更可充分解釋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為什麼反日的情緒及原因，這也是資產階級（日本政府）和無產階級（台共）對立的開始。

也可以運用「政治衝突理論」來說明日治時期台灣左翼團體和日本政府嚴重對立的原因，如同政治衝突理論學者 Tilly 所說的：對革命團體而言，一種權力結構中的既定位置的要求，是最關鍵的，而整個台共短短四、五年的歷程，便是因為黨內的革命菁英一直不停的內耗鬥爭所造成。社會主義是由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理想所衍生，但同樣也是因為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念而使得社會革命團體遭受到潰散的命運。

名詞釋義

一、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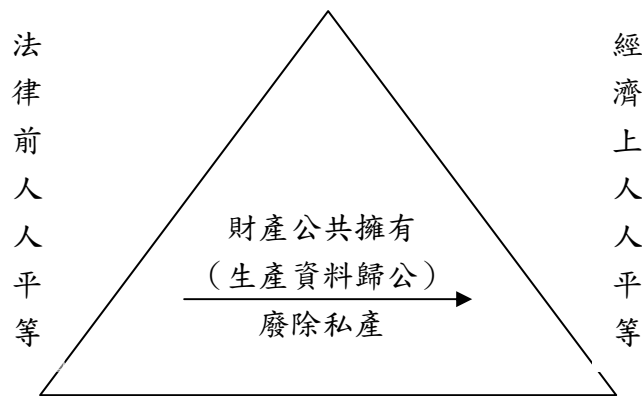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socialism）一詞是由拉丁文 *socialistae* 或 *socialistus* 衍生而成。這兩個拉丁字是指主張人的天性乃社會的（人是社會的動物），那些 17 或 18

世紀自然法學者的通稱。(洪鎌德, 2002; 28) 以反對布爾喬亞⁴, 而帶有現代意義的「社會主義」一詞卻是在 19 世紀初葉出現在西歐。「社會主義」可以說是從布爾喬亞(有產或資產階級)產生出來的一種學說和運動(群眾運動)。這種理論與運動之目標在於共同擁有生產資料與財產的基礎上重建社會秩序。

國內學者洪鎌德認為社會主義的泉源可回溯至上古與中古的基督教, 以及羅馬天主教會及其分之其流派之上。1830 年代, 在法國和英國出現了幾個社會主義的團體與組織, 1848 年法國二月革命便是工人以社會主義為號召而發起的; 而接下來便是由馬克斯和恩格斯貶斥為空想的烏托邦社會主義, 如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的學說開始在歐洲流傳, 他們主張以和平、緩進的手段來致力於社會必要的改造, 雖然被馬、恩二人、斥為「烏托邦的夢幻者」、「未對歷史和階級進行科學分析」, 但實際上這些學說並非一無可取, 學者認為其中歐文的「社區實驗」, 對近代的合作運動和工會運動貢獻非凡。

「黑色馬克思主義」(Black Marxism)倡導者羅賓遜(Credic J. Robinson)認為西方社會主義早在工業生產出現之前的 13 世紀即崛起, 所以社會主義興起的年代, 要比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出現提早五百年左右。(Robinson, Credric J, 2001) 葛倫貝(Carl Grunberg, 1861-1940)認為這個名詞最早在 1831 至 1832 年的法國出現, 在 1837 年以後, 便在英國使用。葛倫貝還企圖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一區隔, 結果發現兩者都是要徹底重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秩序, 其最終目標在把生產資料(財產)歸公。狄徹爾(Heinrich Dietzel)以為社會主義視社會原則大於個人利益, 個人只是達成社會協和的工具而已, 至於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卻在使個人解放, 個人的自由是其終極目標。而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認為社會的革命性改變, 先是把資本主義摧毀, 建設社會主義按勞分配, 然後把社會主義轉型為共產主義。學者洪鎌德主張共產主義的社會應該是生產力極高的社會, 其整體財富充盈, 可以讓人人各盡所能、

⁴ 布爾喬亞意指現代資本家階級, 佔有社會生產資料, 以及使用僱傭勞動。——恩格斯



資料來源：洪謙德，社會主義（臺北，臺北，一橋）頁 32

社會主義的基礎是廢除私有制——一切社會不公正與不平等的來源。但這樣仍不足以釐清社會主義。英國社會主義者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對社會主義給予以下的定義：

「社會主義意味著在一個民主形式的政府下，土地與資本公有制（*Propriete' commune*）。它意味著為使用而非追求利潤的統制生產（*production dirige'e' en vue de l'usage et non duprofit*）。產品的分配，如果不是人人均等，至少要證明與公共利益有關，才容許差別的存在。⁵」

二、馬列主義

共產主義（communism）這個字眼最早出現在一八四〇年的巴黎，它指涉「一種理想」、「一種計畫」、「一個藉以實現理想之政體型態」等三個既相關，但又各自獨立的現象。⁶ 共產主義被認為馬克思主義加強暴力因素所衍生出來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再修正（Richard Pipes, 2004；35）。所以我們必須先對馬克思主義做一統整性的敘述：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提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強調實現財產消亡理想

⁵ 引自 Decugis 的 *Les e' tapes du droit* 《法律的階段》

⁶ 在所謂的「社會主義」（socialism）與「共產主義」間，並無很清楚的區隔。例如馬克思便將共產主義的實踐分成兩個階段：首先在過渡過程中，舊有的不平等儘管在基礎已遭摧毀的情況下，仍會暫時保留下來，接著在第二個更高的階段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將取代「同工同酬」原則；至於列寧雖將這兩個階段分別稱為「社會主義階段」與「共產主義階段」，但在奪取俄國政權後不久，他卻將其政黨從「社會民主黨」改稱「共產黨」，因此我們也必須使用「共產主義」來解釋列寧所主張的理論及其運作的情況。參考 Andr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Stanford,1995),93。

的平等社會不僅「應該」存在，從經濟的自然演進來看，此種結果也「必然」會發生。由此看出，馬克思的社會演化概念顯然是受到了達爾文(Darwin)所出版的《物種原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影響。將演化論主入社會主義學說的結果。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終將讓位給社會主義，在當時的國際及社會環境下，這樣的學說深深吸引著知識份子；而工業化帶來沉重的社會動盪，勞資之間的抗爭更時有所聞，所以馬克思主義除了知識份子外，也在勞工階層中獲得一定的支持。

馬、恩兩人把社會主義放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在時間面上，把社會主義看成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延續和揚棄（保留資本主義注重生產力的提升，放棄資本主義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剝削），也就是人類進入共產主義樂園的前哨站。馬、恩二人剖析了階級社會的結構、運作方式以及階級鬥爭成為改變社會結構，導致社會變遷之動力，從而客觀地、「科學地」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來龍去脈，並且使用自然科學精確預測的方法來預言社會主義終必降臨。

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的貢獻是與早期的社會主義相對照，馬克思主義者（下稱馬派）的社會主義有下列幾種特色：

一、藉由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之批判，才能理解資本主義制度並非永恆存在的現象。理解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與經濟關係，以及其必然的走向（社經本身的矛盾導致工人階級最終的暴力革命，摧毀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而迎接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才能落實社會主義者之要求—廢除私產、公共擁有、人人平等。

二、過去的社會主義只強調：受到統治者、優勢階級者所欺侮壓迫的社會底層大眾（農人、工人、奴隸、貧民、賤民等等）是對抗強權的力量。但馬派人士卻是推翻資產階級的重責大任交給勞工階級、無產階級、普勞階級⁷。是故馬派社會主義最重大的突破是企圖把工人轉化為革命者，強調無產階級的革命，以及革命完成後，短期間的無產階級專政。

三、堅持普勞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就是社會主義的實現。這點與早期社會主義者，強調社會的緩慢與和平改革截然不同。換言之，前期社會主義者儘管理想一大堆，甚至也在英國與北美進行社會主義的實驗，成立各種各樣的模範村、與實驗性公社、合作社，最後卻無疾而終。不像馬派講究先鋒隊、前衛、革命黨之組成，以及奪權謀略、違反策略之步步為營。至少在俄國，以及中國成功地打倒舊政權，掌控國家的權力。

⁷ 普勞階級為現代支薪勞工，沒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力，以維持生活。—恩格斯

四、未來社會的民主架構。過去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不是強調人人平等、富裕、溫飽，便是期待社會和諧、快樂。這些理想馬派也談及，至少馬克思說到未來的人類，不再受分工的限制，而可以隨心所欲作一個「真正的人」（「完人」，*eigentlicher Mensch*），既是獵人，又是漁夫，又是牧民，更是吟詩作詞的文人或文學批評家。不過有關未來共產社會的民主結構，馬克思本人雖然沒有言明，但其徒子徒孫在 20 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已呈現兩種模式：共產黨專政的舊蘇聯、舊東歐諸國、當今的中國、北朝鮮、越南和古巴，這是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t countries*）。另外一個模式則是推動社會民主的德國、法國、北歐諸國。

三、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理論根據，受了洛克的政治學說、盧梭的天賦人權等影響。不過，直接的理論基礎，來自於英國的社會思想家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他的《政治正義》一書，從哲學的角度為無政府主義奠定理論基礎。他提出「理性」與「道德良知」是人類思想與行動的指南，因此擁護無神論，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主張以「道德教育」改造社會。他認為理想的社會是所有獨立自主的個人，沒有任何的制約，因此反對政府組織與法律，認為只有「道德良知」可以使人行善去惡。第二個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基礎來自德國的施蒂納，（本名施米特，*Kasper Schmidt*），他的《唯一者與所有物》（1845）一書，為無政府主義的個人絕對自由學說，提供學理根據。施蒂納認為宗教、法律及國家等都是束縛個人自由的鐐銬而已，必須加以去除。（路哲，1990：11）此兩人的學說為無政府主義的「個人絕對自由」與「廢除政府法律」等，提出了初步的哲學思想，為後來的普魯東、巴古寧、克魯泡特金等無政府主義者，立下了政治思想的基礎。

「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奠基者—普魯東」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他認為自由是人最崇高的權利，只受正義的限制，而正義就是自己享有自由並允許他人享有相同的自由。普魯東的理論就是互助主義，他認為政府組織造成特權與壟斷，造成不平等與不公正。

「無政府主義之父—巴古寧」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他的主張不同於普魯東的私有制，他的「無政府主義的集體主義」，認為土地繼承權和私有制

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主張廢除。他也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他的思想是「自由」，而共產主義限制了人的自由。「我敵視共產主義，因為他否定自由，而我不能設想任何人類的事業可以離開自由。」

「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倡導者—克魯泡特金」他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主要內容：

- 一、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人類進化的要素。
- 二、未來社會將是通過自由契約組織起來的城鄉自由公社。
- 三、滿足一切人的需要才是萬人安樂的社會。

克魯泡特金的理想社會是一個沒有政府、沒有強權、沒有法律，人人發揮互助本能，自由平等的社會。

綜合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主要在強調人類互助的、自由的、平等的「各取所需、各盡所能」的社區生活。主張理性與科學，反對宗教。主張共產制度，反對資本主義。主張人已沒有權力的統治關係，反對國家組織。主張道德人性，廢除法律等。中國民初時期的劉師復在「無政府淺說」一文中，也曾對無政府主義做粗淺的詮釋。如下：（一）政府制度存在，導致人凌人；（二）社會擾亂之起由於人之有爭，爭源由於社會組織不善，非法律所能為力。而社會黑暗罪惡產生，則起因於私產制度。故主張剷滅私產制度，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三）人類道德不良，由於社會之惡劣；社會之惡劣，由於有政府。若萬惡政府去除，人類道德必歸於純美，故無須教育；（四）人之所以好逸惡勞，由於私產制，故應去除私產；（五）人之發明，大抵本之於改良社會，故無競爭亦能進化。（文定，1980；13-14）至於何謂「無政府共產主義」？師復認為「主張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統治，廢絕首領及威權所附之機關及學說也」因此，「無政府者無強權也」，「政府實為強權之巨擘」，故無政府主義之首要任務即為「去除政府」。

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主義色彩，深深地扣住了知識份子的內心，但人們對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了解都極為含混，不明白兩派的歷史恩怨及理論歧異，第一國際的失敗便是由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角力。⁸儘管無政府主義者與

⁸ 關於雙方長期對立、衝突的歷史，下列的著作提供豐富的史料：G .D. 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ii, Marxism and Anarchism, 1850-1890*(London：Macmillian,1969)；Saul K. Padover, ed, *Karl Marx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McGraw-Hill, 1973)；David Fernbach, 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Harmondsworth：Penguin, 1974)；Hostetter, 1958；

社會主義者有著共同的目標，是一個沒有階級且國家消亡的社會，同樣也是透過暴力革命手段來達成目標，但他們之間仍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首先，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具革命潛力的並非勞工階級，而是無地農民與失業者。其次，社會主義者將資本主義崩潰與共產主義勝利視為一個連續過程，屆時新的統治階級將利用國家擁有的懲罰力量來解除資產階級的財產，並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但無政府主義者則根本否定國家的必要性，甚至預言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另一種壓迫機制罷了，最後得利的將是知識份子。最後，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依賴資本主義的進步所帶來的革命動力，無政府主義者則要求「直接行動」，也就是立即向既存體系發動攻擊。

由於無政府主義派受其理論局限性的影響，而其本身活動也多偏重於知識階層，所以於廣大民間一直無法發揮其影響力，加上馬克思派在第三國際的支援下，有計畫的攻擊排擠，無政府主義遂逐漸失去其影響力，因之漸趨沒落。以意識形態的宗派來衡量，雖然無政府主義的成效不彰，因為他未曾影響到世界史的進程；但就作為其他意識形態與運動的思想媒介而論，也自有其不可抹滅的成就，例如無政府主義反對社會不平等的主張，促使女性主義的興起，也強調人與自然的觀念，亦為當今激進環保運動及文化多元論等所吸收發展。⁹總之，就理論上來說，就理論上來說，無政府主義反強權，並採取直接行動將思考賦予戰鬥性的實踐，可謂之無政府主義對政治思想的持續貢獻，或稱之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挑戰。（王遠義，2004）

四、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這個詞語，由語義學的觀點上來看，一直是模糊而曖昧的。而「知識份子」的概念也隨著時空轉移而有所變動，無形中增加了界定與分析這

David Ri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系統的研究，可見：Paul Thomas, 1980, 249-353；Esenwein, 1989, 11-50。參考王遠義：2004。

⁹ 代表作可見：M.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London: Black Rose Books, 1986)。

一群人的困難，所以它代表的意涵不但多元、而且多變。(葉啟政，1984：18-31)而就「知識份子」此概念發展的歷史脈絡來看，大致在十九世紀，西文「知識份子」一詞即見諸於世了，但此語詞一直維持一種蔑視的意思，乃意含一個人不具想像創造力的世俗論者。而真正具現代意思的「知識份子」一詞乃源於俄國與法國。後來波蘭學者 Gella(1976)又加以考證，以為應當源於波蘭。現即分述如下：

以俄國的「知識份子」來說，Malia(1961：2)以為，不管是屬哪一代，本質上他們的意含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所以知識份子不應被視為革命反動份子。他說：

「說實在的，此一字眼自從被創用以來就至少有兩重疊的用法：或指所有具思考能力的人—Pisarow 所謂的『批判思考的實在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這只是最極端與有名的顯例；或更狹義的指，反對的知識份子，不論是否為革命份子。」(Malia，1961：2)

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生後，知識份子乃指涉「在社會主義秩序下與無產階級和苦難農民站在一起的棟樑(Pillars)」至此，知識份子不再具有批判思想的指謂。

就法國而言，「知識份子」即為「intellectual」。西方學者認為此字源乃泛指那些帶波西米亞聖徒式(Messianic Bohemians)的文人，他們長年逗留在咖啡店中批評時政，以天下為己任。(Salomon，1960)可看出他們著重的是心態與社會的角色，此即與俄式定義不同。

而波蘭學者 Gella 也考證出遠在一八六〇年代，波蘭已出現了一個文化上同質性甚高的團體，他們勇於批判社會，也關心國家前途。因此當波蘭被列強分割時，這一批人成為反抗統治者的主要力量。Gella(1976)。

在中國的歷史中，與「知識份子」所指謂最為接近的是「士」與「儒」了。

¹⁰在中國社會中我們一向慣稱的「讀書人」，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也足以稱之為「知識份子」。但當科舉制度建立後，中國知識份子在制度化的晉陞管道與君權至上政治健治的高壓下，顯得十分的軟弱無力，甚至成為統治聯盟的一員後，也喪失了從既存制度性結構中改造的任何機會。（S. N. Eisenstadt, 1992: 8）此時期的知識份子除了講求個人修養的成就，在精神上對政治也抱有極大的興趣，也往往認為統治權威應向他們負責，非政治精英如此，政治精英亦然。

Eisenstadt 認為有如此多元的精英團體存在，遂產生了不同抗爭運動與政治衝突間，在結構上與意識形態連結的可能性，也因彼此關係之密切，發展出兩種知識份子¹¹與不同精英間緊張關係之類型。第一種是指各類知識份子與權力間的關係，而另一種是知識份子企圖將其特有的社會文化秩序之概念加諸於其他精英及更廣泛的團體與階層；而這種企圖，一方會希冀運用其權力與影響力，另一方則希望在不同領域中保持知識之專業與創造的最大自主性，其矛盾與緊張可想而知，而此理論也給予日治時期的社會主義團體為何會走向分裂提供學理性的解釋。

而學者葉啟政綜合 Nettl、Eisenstadt、Weber 的理論，對「知識份子」的指謂和意含做出說明，他認為「知識份子」的基本定義是：

- (1) 強調品質性或範圍性觀念。
- (2) 關心社會政治事務與否。
- (3) 是否具有批判精神與不滿心理。
- (4) 依附政治或經濟組織建制的程度。（葉啟政，1989；50）

五、社會運動

Donatella della Prota 對於社會運動曾提出四個集體行動研究觀點：集體行

¹⁰ 有關士與儒的討論，可參看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知識份子》（台北：眾文，民國 67 年）頁 119-124；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49 年）；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民國 69 年）。

¹¹ 一種是指涉不同的知識份子與他們的個別組織間，是各種知識、文學或美學活動等不同符號領域內獨特的專才；另一種則是指稱那些關切社會文化前提的知識份子，他們將宇宙與文化秩序模式予以銜接，並且加以傳播、選用與符號化。見 S. N. Eisenstadt 前揭書，頁 5。

為 (Collective behaviour)、資源動員 (resource mobilization)、政治過程 (Political process)，以及新社會運動 (new social movements)。¹²但由於本論文的研究主題著重在知識份子在社會運動中擔任的性質角色的分析，所以較多援引使用其中的政治過程理論，而政治過程理論是將社會運動是唯—種新興的利益團體，並把注意焦點放在社會運動匯集和展現不同利益的過程。這個理論取向的主要研究關懷在於社會抗爭與體制化的政治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政治過程論者認為，社會運動再挑戰既存政治秩序時，也會與佔據此一秩序中重要位置的行動者之間，發生一定程度的互動。¹³

Tarrow Sidney 也整合了他對社會運動的經驗研究，是關於他對義大利的抗爭循環研究中所提出的理論架構，包含了幾個他認為具有關鍵性的政治機會結構因素：「正式政治管道的開放或封閉程度」、「政治結盟的穩定或不穩定程度」、「潛在盟友的可近性和策略態度」(Tarrow Sidney, 1989)，以及「精英團體之間和之內的政治衝突」。而當筆者研究日治時期的政治團體的發展及衰微過程時，便和 Tarrow Sidney 的理論架構互相呼應，如他理論中的「正式政治管道的開放或封閉程度」此論點便可探究當時文化協會 (即所謂的民族派運動人士) 及其發起的台灣議會政治請願運動在殖民地政府所能發揮的自治民主程度；蔣渭水離開新文協後自組〈台灣民眾黨〉和台共幹部 (如謝雪紅) 間理念的分合也可解釋為政治結盟的穩定與否；臺共及其政治理念相近的農民組合在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中一直被視為是同一脈絡下的思想體系，在此論文中也將討論臺共及農民組合在這段合作過程中的行動策略及菁英份子間的關聯性；而菁英團體相互間理念衝突而導致團體覆滅，本論文第三章所談及的臺共歷史則是此理論的寫照。而這也是筆者在論述日治時期的政治團體時要援引社會運動理論的原因。

而將當時日本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等社會問題提示到大眾面前，讓台灣百姓激起解決極權壓制的意識，這些都是當時身受社會主義及世界性的思想風潮影響下的知識份子所提倡的。所以說，知識份子是社會運動的主導者，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也是由於知識份子的參與 (張曉春, 1989; 300)，而學者葉啟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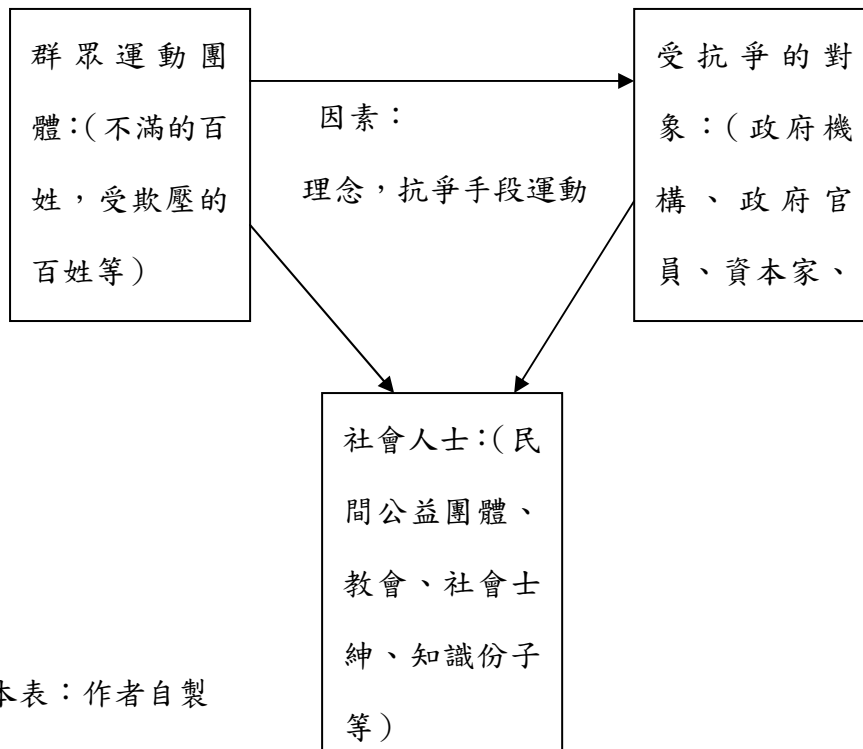
¹² Donatella della Prota (1996d): *Movimenti Social. Rassegna Italiana di Sociologia*, 37, 313-31. ; 此段參閱 Donatella della Prota/Mario Diani 著 苗延威譯, 2002; 頁 4。

¹³ Charles Tilly (1978: 53) 在此處把社會運動說成是「挑戰者」，已與社會體制下的其他成員間作出區隔。

認為知識份子身兼社會運動的理論及實踐角色。而此論文的研究方向將分別由外來政體、意識形態、社會變遷及菁英份子來說明當時社會運動的發展形式及其行為結果，再對於當時歷史下出結論→社會主義對日治時期台灣的左翼運動產生的影響究竟為何？

表 1-1

群眾運動的參與者關係



本表：作者自製

第五節 研究資料與文獻分析

近廿年來在學術界或一般民間都有大量的台灣史研究著作出版，而以往研究學者對台灣歷史的研究都由清朝開始回溯，這乃是因為歷史是全盤的發展，但由於本篇論文的主要研究時間著重在日治時代中期時，許多具有參考價值的資料限於篇幅只能酌予參考，僅就日治時期的政治研究及當時盛行的思想體系作一介

紹。

當時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薰陶，影響所及辨識集黨結社的出現及政社會運動的風潮，所以本論文參考的學術論文及專書著作也大多是講述台灣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而在近代台灣政治運動的研究中，台灣本地的學位論文和研究相關者有：

簡炯仁：《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的反日運動——台灣民眾黨之研究》（1977 臺大政研所碩士論文）、陳俐甫《日治時期台灣政治運動之研究》（1995 台大政研所碩士論文）、林柏維：《台灣反日運動團體——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1921—1927）》（1984 文化史研所碩士論文）、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1986 師大史研所博士論文）

而國外學術論文和本論文有關者有：

陳以德比較韓國與台灣的日本殖民主義（美國賓州大學博士論文）、許世凱和若林正丈研究台灣反日運動的博士論文、涂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經濟研究、盧修一（法國巴黎大學博士論文）與簡炯仁的臺共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碩士論文），向山寬夫的《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民族運動史》。其中盧修一的《日治時代台灣共產黨史》本書呈現出台共清楚且具體的輪廓，陳芳明所寫的《謝雪紅評傳》也是研究台共最詳實完整的巨著。

前者所舉之論著皆是著重在日治時期的特定政治事件或是人物做研究，而以全面性觀察台灣政治運動，以政治運動通論著作出現的有：

蘇新以莊嘉農微比名香港出版的《憤怒的台灣》（1949）是屬於政治史為主的著作，蘇新以中國共產主義者的觀點，批判美日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也有部分篇幅在介紹日治時期的左翼運動，蘇新到了中國大陸後仍出版了《未歸的臺共鬥魂》（1993）、《永遠的望鄉》（1994），其中包括了蘇新的書信、回憶錄和晚年的文稿，對於日治時期的臺共相關活動也有諸多描述。

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1971）原是葉榮鐘於報紙連載的文稿在改寫而成的，書中對於左翼活動完全未談及。史明（施朝暉）《台灣人四百年史》（1998）是以台獨左派的立場來解釋日治時期的歷史，關於日治時期的資料主要仍是參考《警察沿革誌》，後來楊碧川的《日治時代台灣人民反抗史》（1988）也多是參考史明的觀點而寫成。

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1980），王詩琅本身雖是左翼運動

人士，但此書內容卻是以右翼民族運動為主；其他還有連溫卿的《台灣政治運動史》(1988)此書的出版是台灣史學界民間史料及研究的一件大事，本書成書於一九五六年，原書名為《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當時政治局勢敏感未能出版。連氏是當時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物，又涉及許多政治社會運動團體的組織，論者將此書譽為「第一部由台灣左派知識份子所寫作的中文台灣史」(連溫卿；1988，3)。

若林正丈以研究台灣共產黨及第三國際為起點，成為台灣史學者中當紅的日籍人士，《台灣反日運動史研究》(1988)被本地的台灣史學者吳密察譽為：關於台灣反日運動史「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成果」(吳密察、若林正丈，1989；165)。若林正丈嘗試基於相同的史料尋找出不同的研究和解釋的方向，除了研究台共問題之外，他也對台灣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發表過專著，若林正丈歸納日本在台灣有「透過交換、仲介」與「透過規律、訓練」、「透過懲罰、威嚇」等三種統治機制，(若林正丈，1995)他認為台灣的政治運動是以菁英為主的運動，而此點也正是筆者論文的寫作方向。